

H15/77

31857

张会恩 曾祥芹 主编

文章学教程

WENZHANGXUE JIAOCHENG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1511464

(沪)新登字107号



21511464

文 章 学 教 程

主编 张会恩 曾祥芹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太仓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 12.75 插页4 字数312,000

1995年5月第1版 199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本

ISBN 7-5320-4182-4/G·4107 定价:(软精)12.00 元

目 次

导 论

第 一 章	文章学的自立	(3)
第一节	文章学的研究对象	(3)
第二节	文章学研究的回顾	(10)
第三节	文章学自立的意义	(13)
第四节	文章学的学科体系	(17)
第五节	文章学的研究方法	(21)

本体篇

第 二 章	文章的信息	(27)
第一节	文章的事料	(27)
第二节	文章的意旨	(36)
第三节	文章的感情	(44)
第四节	文章的境界	(50)
第 三 章	文章的体式	(57)
第一节	文章的结构	(58)
第二节	文章的语体	(65)
第三节	文章的体裁	(70)
第四节	文章的技法	(76)
第 四 章	文章的风貌	(84)
第一节	文章的气势	(85)
第二节	文章的风格	(91)

第三节	文章的作风	(97)
第四节	文章的美质	(104)
过程篇		
第五章	文章的写作过程	(115)
第一节	文章的感受积累	(115)
第二节	文章的构思谋篇	(122)
第三节	文章的起草行文	(129)
第四节	文章的润色修改	(133)
第六章	文章的编辑过程	(139)
第一节	文章的选题、组稿	(139)
第二节	文章的评审、取舍	(147)
第三节	文章的加工、编排	(154)
第四节	文章的读样、推荐	(158)
第七章	文章的阅读过程	(164)
第一节	文章阅读的选择、感知	(164)
第二节	文章阅读的理解、想象	(169)
第三节	文章阅读的欣赏、评价	(177)
第四节	文章阅读的记忆、应用	(185)
主体篇		
第八章	文章的作者	(195)
第一节	文章作者的心理动力	(196)
第二节	文章作者的思维运演	(209)
第三节	文章作者的美学追求	(216)
第九章	文章的编者	(224)
第一节	文章编者的心理动力	(225)
第二节	文章编者的思维运演	(233)
第三节	文章编者的价值追求	(239)
第十章	文章的读者	(245)

第一节	文章读者的心理动力	(247)
第二节	文章读者的智力发微	(255)
第三节	文章读者的关键素养	(263)

本质篇

第十一章	文章的性质	(275)
第一节	文章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	(275)
第二节	文章的本质在于表现思想	(281)
第三节	“文原于道”析	(286)
第四节	“文原于五经”辨	(291)
第十二章	文章的功能	(296)
第一节	文章的认知功能	(296)
第二节	文章的实用功能	(304)
第三节	文章的审美功能	(309)
第十三章	文章的规律	(315)
第一节	文章的内外规律	(317)
第二节	文章的写作规律	(326)
第三节	文章的编辑规律	(332)
第四节	文章的阅读规律	(337)

史 论

第十四章	文章发展简史	(345)
第一节	文章发展的古典形态	(345)
第二节	文章发展的现代形态	(360)
第十五章	文章学历史简述	(370)
第一节	古代文章学发展历史	(371)
第二节	近现代文章学发展历史	(385)

后 记	(397)
-----------	-------

导 论

第一章 文章学的自立

〔本章要旨〕

自古而今的“文章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文章”概念的演变，由广义而渐趋于狭义，即研究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表达主观情志、用于社会交际、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的学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然而因循守旧的观念常常禁锢人们的头脑，以致忽视这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文章自身的特殊矛盾性决定了文章学终究要从“文学学”中分离出来，用自己独有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建构起它科学的学科体系。文章学的自立于“文化学”之林，与语言学、文学学鼎峙而三，实在是建设“语文学”完整体系的一大幸事！

第一节 文章学的研究对象

文章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文章，但什么是“文章”，古代和近现代都有过各种定义和界说，从未划一，有过各种称谓，如“文”、“章”、“笔”、“文章”、“文笔”、“文辞”、“文学”等等，但都外延甚广，没有确切的界限。然而，作为一门学科，不可不明确其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一、古代文章概念

先秦时期，“文”的初义、本义是“饰藻杂采”。如《易·系辞下》说：“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

故吉凶生焉。”《说文解字》说：“文，错画也，像交文。”《释名·释言语》说：“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广雅·释诂》说：“文，饰也。”而“章”亦为彩色。《书·皋陶谟》说：“五服五章哉。”孔《传》释义说：“尊卑彩章各异。”“章”又与“彰”音同义近，而且同见于典籍。如《书·伊训》说：“嘉言孔彰。”《书·皋陶谟》说：“彰厥有常。”均为鲜明显扬之意。正由于“文”和“章”都指色彩，所以人们即以青与赤相配为“文”，赤与白相配为“章”，而“文章”一词就由此搭配而成。《庄子·胠篋》说：“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文章”一词的意义在先秦也不固定。有时指“礼乐法度”，如《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礼·大传》：“考文章，改正朔。”有时指“经籍”、“典籍”，如《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有时又指“车服旌旗”，如《左传·隐公五年》：“昭文章，明贵贱。”而“文章”的这些意义，有时又以“文”的概念来替代。如《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述而》又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雍也》又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这里所谓“文”皆指上述“典籍”的意义。

先秦时期“文学”一词，涵义也极广泛，且与“文”、“文章”交叉。《论语·先进》说：“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游、子夏。”邢昺疏云：“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邢昺把“文”解释为“文章”，把“学”解释为“博学”，未免有“增字解经”之嫌。究其实质，孔子所谓“文”多指“典籍”，合乎邢昺“博学”的意义，所以“文学”实则也就是“文”即“典籍”的意思；只是用于论诗则合乎邢昺“文章”的意义，这倒与今天我们所谓“文学”的意义相近了。

孔子之后,诸子争鸣,曾广泛地使用“文学”的概念。《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阙也,玉人琢之,为天下宝。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墨子·非命篇》:“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为之道也,则不可不先立仪法。若言而无仪,譬犹立朝夕于圆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韩非子·六反篇》:“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以上所说的“文学”,都是指的“学术”,而非我们今天所说“文学”的含义。

西汉东汉,“文章”、“文学”两个概念始有所分,但又出现了“文辞”一词。《史记·儒林传》说:“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又说:“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里,“文学”仍然是指“学术”,而“文章”则几乎等于“词章”了。这种例子,在《史记》中甚多,只是有时又称“文辞”,大致同于我们今天所谓“文章”。司马迁的这种用词是有意区分“文章”与“学术”的开始,是一大进步。班固《汉书》大体继承这一传统。如《张汤传》写其少时“劾鼠掠治”时说:“……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又说:“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这里所说的“文辞”与“文学”,就是指的“文章”与“学术”,完全同于《史记》。整部《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七略》,将《诗赋略》与《文艺略》、《诸子略》等并举,也是判“文章”与“学术”为二途,其指趣是十分明显了。只是这“文章”概念的内涵尚无明确的界划,仍然是一个笼统的、广义的概念。如《扬雄传》仍然把《太玄》、《法言》、《训纂》、《外藏》、《广离骚》和四篇赋作统称之曰“文章”。至于王充《论衡·佚文》篇把“五经六艺”、“诸子传书”、“造论著说”、“上书奏记”和“文德之操”统称为“五文”,仍以一“文”字概之,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魏晋的情形仍然相同。曹丕《典论·论文》和挚虞《文章流别

论》所使用的“文章”都是广义的概念。

南北朝，“文”、“笔”之名兴起，“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文心雕龙》篇目的排定，亦适好隐区“文”、“笔”二体。但仅以韵之有无为标准，自然没有言中要害，且易遭致“偏重形式”之讥。所以，梁元帝《金楼子·立言》在强调“绮縠纷披”等形式文采的同时，又强调“哀思”、“情灵”等内容的重要，希望做到“文质兼重”，而且似乎感到此前的“文章”概念无所不包，实属大而无当，“文学”的特征并未突出。于是，萧统《昭明文选·序》提出了一个严格的“文学”标准：“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从而把“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以及“记事之史”、“系年之书”等“经子史”都看成是“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的狭义文章，完全摒除在“文学”之外，这在今天看来，是“文章”、“文学”分道扬镳的一个好势头！

然而隋唐两宋，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复古口号的风行，“文章”概念的内涵又复扩大，“文”、“文辞”、“文学”与“文章”又混同一气。如韩愈《进学解》和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就把“学术”与“文学”的概念混同不辨。欧阳修《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曾巩《王平甫文集序》或则称“文”称“辞”，或则“诗”、“文”并举，均承韩柳余绪，在南北朝的基地上又走了回头路。清人阮元《与友人论文书》曾予评论说：“夫势穷者必变，情弊者务新。文家矫厉，每求相胜，其间转变，实在昌黎。”认为韩愈的主张，不过是为了矫正《文选》的流弊，但如果仅仅是“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阮元是个骈文中兴论者，他这里所谓“文章”自然指合乎“美文”条件的“骈文”，当然是偏颇的，但其对古文家作践“文学”，倡导文章形式也要复古的批评，则是可取的。

唐宋以迄明清，虽然文章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逐渐泾渭分明，但其概念的内涵依然暧昧莫明。

二、近现代文章概念

如前所述,近代阮元力主“文”、“笔”有别,提倡骈偶,以有韵对偶者为“文”,无韵散行者为“笔”。刘师培本其衣钵,又从而广之,以“文”训“文”、“章”之古义,从而以“彰彰”为“文章”,把“无韵散行”之“笔”排斥在“文章”之外(见《广阮氏文言说》)。可见,从阮元到刘师培等“文笔派”之流的“文章”概念又极为偏狭,颇难取得更多人的共识。改良主义派、国学大师章炳麟《文学总略》曾给予批驳说,《说文》对“文”、“章”、“彰”、“彰”的解释,导致了“文章”即“彰彰”的错误看法。他认为“博学于文”的“文”不能作“彰”,“出言有章”的“章”不可作“彰”。“古之言文章者,不专在竹帛讽诵之间。……文章者,礼乐之殊称矣”。他认为上古所谓“文章”含义极广,“其后转移”,才“施之篇什”。他结论说,“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彰,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彰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彰,是故推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彰彰为准。”他既不同意萧统仅以“沉思翰藻为文”的看法,也不苟同阮元、刘师培一味崇尚骈辞俚语、是“文”非“笔”的观点。章炳麟的看法自然是正确的。但是他批评阮元“遂忘文字”,自己又仅仅“以文字为准”来解释文章、定义文章,认为“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一切从古文字的基点出发来非难他论,也有不足,也是一种偏颇。

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多次给文章下界说。如说:“故夫文者,聚灵府之能力,综万端之异名,藉以表现精神者也。”又说:“精神所贯注,融会其形迹,奇情逸响,表于简端,借字之用,写其已成之文,未有执意选词,始为文章者也。”综合看来,既涉及到客观外在的“万端异名”,又论及到主观灵府(头脑心灵)的精神融会,还兼及到字、文这个精神载体,可以视为主体反映客体并物化为载体的文章定义。田北湖的看法正确而有价值。但其“文章”仍然是个广义的概念,是完全概括文学的。

要而论之,近代文坛各种文派的“文”、“文章”、“文学”(或文字、文辞)的概念,依然是界划未清的。虽然是各持一派理论主张,或以偶韵来诠释文章而非“笔”类,或以文字音义来解文章,从而割裂文字语言与文章、文学的联系,但未能正确地区分文章文学,未能正确作出科学的定义,则是其共同的弱点。

现代文章的概念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总的来说是由含混不明逐步走向明确。

前一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仍然是个一统的广义文章的时代,但其间已渐有文章文学概念之区分。

顾实《〈文章学纲要〉序论》(《国学丛刊》第10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在引述先秦两汉许多典籍之后说,有“口说而得之曰文辞曰文章”的,有“文笔而得名之曰文章曰辞章”的,而且认为数千年来,如此相承,“谓文笔曰文章之名称确定,通行无异义”,总之,文章“为传达思想之利器也”。这种文章定义,自然也是广义的。汪馥泉《文章概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分析文章有“作者”、“意思”、“文字”、“表达法”、“读者”五个要素,有“历史性”、“社会性”、“个人性”三种特质,接触到了文章的内外规律,从而结论说:“文章的定义是:受了历史的社会的个人的限制的作者,把真实的正确的意思,用现代的文字,藉最有效的表达法,传给一定的读者。”这一定义是其文章“要素”论和文章“特质”论的综合,说到了文章的客体、主体、载体和受体,应该说是很有学术价值的,可以视为“现代文章”的概念。只是所谓“最有效的表达法”没有予以阐述,因而也只能说是广义的文章概念。

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等的许多论述倒是开始注意到狭义文章的概念了。其《文心》用了较多篇幅论及到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许多具体问题,回答了什么是文章的问题。这自然还是普遍意义上的文章。但在分类的篇幅里,已将广义的文章分为“普通文”和“文艺文”两大类,它们的区别全在手法的实写和虚构的不同、题旨

的显露和含蓄的不同：“单只根据实事写成的是报纸的记事、历史的转载之类的东西，便是所谓叙事文”；“小说不一定要根据实事。即使根据实事，也不像叙事文那样记叙了实事便完事，还得含有其他的东西在里头”，“把意义含在故事中间的才是小说”。“如果在叙述一切经过之外，加上许多意见，……这就不成为小说而是一篇议论文，那些故事只处于议论文‘论断’的‘例证’的地位了”。这就从认识论和反映论的角度，从根本上划清了“普通文”和“文艺文”的界限。仅有前者是狭义文章的概念，兼容后者则又是广义文章的概念了。在夏丏尊、叶圣陶、刘薰宇的许多文章学著述中，大都持广义文章观点，但重点是在研究狭义文章理论。即使是属于“文艺文”的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只把它当作“普通文”的文章来读。综括他们对于文章的全部观念，可以定义为：文章是真实记载世间事物，外（物）化作作者心情，适应与读者交际的、能独自成篇的书面语言。这个定义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文章生产、流通的全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文章有客体性、主体性、载体性、受体性的本质特征，把对文章概念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然而这一阶段尚有“美文”和“实用文”概念之分。总体说来，“美文”与“文艺文”有同有异，而“实用文”差强同于“普通文”。综观各家论述，大都认为“美文或主传远，故联音韵，比宫商，以便记诵；或主通情和志，故既协歌诵，又必饰以华藻，博其譬喻。实用文则不然，辞达而已”（谢无量《实用文章义法·绪言》，中华书局1917年版）。这即是说，“美文”必须叶音韵，便歌诵，饰华藻，而“实用文”则全无这些讲究。由此说来，“美文”并不包括后起之传奇、小说、戏剧、电影之类，比所谓“文艺文”要窄狭，而“实用文”则基本上同于所谓“普通文”，只是“普通文”之文体范围，在近现代日益扩而大之罢了。

后一阶段，是指本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是：除了继续有广义“文章”概念之外，正式提出了狭

义文章的概念。许多论者主张一切白纸黑字记载的人类精神劳动的成渠统称“书面语言”或“文字记载”。一切审美的“美文”、“文艺文”称“文学”，而切实致用的“实用文”、“普通文”称“文章”。张寿康主编的《文章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首先揭起了这面旗帜。其《绪论》说：“文章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组成篇章的书面语言，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又说：“文章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指实际存在的事物，……不具有虚构、典型塑造的品格，但是也不可能是纯客观的移植、摄像，而是被特定的人所认识到的、甚至是被情感化了的事物”，“不包括诗歌、小说、剧本几类文学作品”。接着，杨振道、韩玉奎编著的《文章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也主张“文章学只研究一般的常用的文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方法与表现客观事物的规律和方法及其相互联系”，认为“一般文章的最大特点是实用性，而实用性又往往与非虚构的特点联系在一起。所以把实用的非虚构的文章作为文章学研究的对象是合适的”。这实际上也承认了狭义文章的概念，明确了文章学的具体研究对象。

第二节 文章学研究的回顾

“文章学”之名出现于宋代。朱熹《近思录》卷二说：“伊川曰：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伊川，即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洛阳人，学者时称“伊川先生”。他分宋代的学者为三，即今所谓“文章学”、“训诂学”、“儒学”，把“文章学”与“语言学”、“哲学”区分开来，并把它放在第一位是有眼光的。

但在宋代之前，早就有文章学的研究存在，宋代之后又陆续诞生了许多文章学的著述。兹略作回顾如次。

古人强调“文成法立”，“学”也就在其中了。据此，华夏自有诗文以来即有“法”、“学”寓于其中，且随之即有了研究之学问了。就

以诗而论,自舜曰“诗言志”之后,周代诗歌即有“风雅颂赋比兴”六义。风以导情,雅以导政,颂以形容,可视为诗的种类。赋者,敷布直陈,于修辞为直叙法;比者,托物相比,于修辞为比喻法;兴者,借端引入,于修辞为序言法。这是讲的措辞方法。这种诗体之论和修辞方法之论就是文章之学。或有论者以为上古至秦即有文章学,依据就在于此。如以文而论,诸子的著述和《易传》之中有关言辞、文学的诸多创始性论点,沾溉后世,影响至今,即可视为纯粹的文章之学。两汉时期,随着诗赋的昌盛,“文学”与“经子史”渐分两途。刘歆《七略》、杨雄《法言》已经论及“文气”等文章学范畴,王充《论衡》(尤其是《语增》、《儒增》、《艺增》、《佚文》、《自纪》、《定贤》、《超奇》、《案书》诸篇)则是洋洋文章大论了。

魏晋以至初唐,文苑波诡,学术纷呈,文章学研究已趋繁荣。曹丕《典论·论文》、葛洪《抱朴子》(外篇之《尚博》、《辞义》、《文行》诸篇)、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均为论文章专篇,极有学术意义。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沈约《四声论》、任昉《文章始》(或曰《文章缘起》)、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均为文章学专著,林林总总,显赫一时,并照耀后世。

中唐至于两宋,盛行科举取士,应试举子都趋于声名利禄,文章由盛而随之衰弱。韩柳首倡古文,并有诸多论列,欧曾继其余绪,且不乏创见,可谓“各有论文章之专篇,颇深篇章之奥旨”。同时,由理学之辨析发展为诗文评析的专著也并不少见。如李涂《文章精义》、陈骥《文则》论及文章修辞,颇具学术价值。如《文则》所列辞藻法有五项,所举比喻法竟有十目,见出研究之精细。论诗之专著,如司空图《诗品》、僧齐己《风骚旨格》、严羽《沧浪诗话》等,因兼及修辞、方法、风格各端,有的完全通融于文章,对于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明清三代,文谈诗话竞相蜂起。元有王构《修辞鉴衡》、陈绎曾《文鉴》,尤以后者为优。全书分《古文谱》、《四六附说》、《楚汉唐

《赋谱》、《古文矜式》、《诗谱》五篇，评论诗赋、骈文之体制、法式、格律，并剖析起端、结尾、序事、论理、用事、养气各项，凡五十余法，极为详审，所惜完书流传日本，而国内只通行《文说》一节，是为憾事。明有朱荃宰《文通》，高琦《文章一贯》，后者稍胜。全书析文章为六法，分文章为八格，其弁序又列“起端”、“叙事”、“议论”、“引用”、“譬喻”、“含蓄”、“形容”、“过接”、“缴结”等九法，虽然多采他书，殊少创见，然而也算完整要约。徐师曾《文体明辨》汇集历朝诗文，其分类法及变迁论，实为文章学之文体论专著。清有方以智《文章薪火》、张秉直《文谈》、梁章钜《退庵论文》、吴德璇《初月楼古文绪论》、刘熙载《文概》等，均为文章学专著。唐彪《读书作文谱》从作文、读书两端入手，评论文章之体裁、题法、辞法、种类，以及诗之体式，虽然显得驳杂，然而亦见委曲详尽。至若明代方孝孺《赠郑显则叙》、清代侯方域《与王任谷论文书》、魏禧《陆悬圃文序》、《宗子发文集序》、朱彝尊《与李武曾论文书》等文章学专文，各有见地，但已不胜枚举了。

近现代的文章学著述繁荣，且已由广义文章学开始向狭义文章学与广义文章学并行不悖的方向发展。

近代的桐城派、湘乡派的论文很多，如管同《与友人论文书》、吴汝纶《与姚仲实》等，都持广义文章学观点。改良主义派，如魏源《国朝古文类钞序》、严复《古今文钞序》等，也是如此。只有“文笔论”派的阮元、蒋湘南、王闿运、李慈铭等比较特殊一点，始终主张“文笔之辨”，坚持“偶韵为文，无韵散行为笔”，认为唐宋八大家之作都不能算“文”，只能称“笔”。这种以“骈偶”为“美文”的观点，虽然不能得更多人的共识，但适好说明，“笔”即我们今天所谓“狭义”文章；“文”中的大部分，如诗、词、颂、赞，为今天所谓“文学”，但也有一部分，如骈文，仍然还是今天文章学研究的对象。

章炳麟、刘师培、田北湖、罗惇颉、姚华等在邓实主编的《国粹学报》上发表文章学研究的论文、专著甚多，影响巨大。章炳麟有